

个人信息泄露案频现“内鬼”

8月23日,北京高院召开北京法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审判情况新闻通报会。会上介绍,2018年以来,北京全市各级法院共审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219件,判处犯罪分子294人,所有已结案件中24.6%的案件涉及高度敏感信息,且五成案件的被告人有较为固定的工作单位或职业。

虽然买卖和交换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要手段,但内部人员泄露信息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要源头,为个人信息保护带来隐忧。会上介绍,行业“内鬼”屡屡犯案,且团队化作案模式愈加成熟,北京高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打击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突出打击重点,加大惩治力度,从严从重惩处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2018年以来,北京全市各级法院共审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219件,判处犯罪分子294人。

所有已结案件中24.6%的案件涉及高度敏感信息。

五成案件的被告人有较为固定的工作单位或职业。

涉案高敏信息占比突出

根据会上通报,2018年以来,北京全市各级法院共审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219件,其中一审179件、二审40件,判处犯罪分子294人。五年来,年均审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今年有所反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玲玲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2018年以来的案件中,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类型中高度敏感信息占比突出。据统计,所有已结案件中24.6%的案件涉及高度敏感信息,包括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和财产信息、公民手机号码、身份证件号码则在各种信息类型中所占比重最大。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规模也日渐庞大。统计发现,在179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一审案件中,除17起案件依据犯罪所得定案外,其余162起均以信息条数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其中超过半数的案件信息数量超过5万条,约1/4的案件信息数量超过50万条,少数案件查获的信息多达数百万、数千万条,甚至过亿。

同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手段越

发隐蔽。孙玲玲介绍,近年来,“暗网空间”已逐渐成为犯罪交易的活跃场所。同时,交易支付方式从现实货币演进为虚拟货币,最常见的如“比特币”。除了交易环境和支付方式日益隐蔽,秘密窃取的技术手段也日益成熟,如“爬虫”软件成为收集大量信息时的常用软件之一。

此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相关联。根据个人信息的来源及流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涵盖了金融、教育、交通、通信、物流、求职、法律等各行各业。排除买卖、交换等中间环节,39.6%的涉案信息被用于违法甚至犯罪活动,如违规提取公积金或办理信用卡、同行不正当竞争、代收代写学术论文、暴力催收讨债、发送招嫖信息、电信网络诈骗、盗窃存款、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等。3.6%的案件由所谓“私家侦探”通过跟踪拍摄、关系查询等方式定向追踪个人,调查特定公民信息。

“内鬼”案件多发

五年来的219件案件,还呈现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五成案件的被告人有较为固定的工作单位或职业。统计,超过半数的案

件,被告人供职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系个体企业经营者。其中,公司职员(包括中高级管理层、法人代表)所占比例最大,为50.3%。

在这之中,不乏利用职务之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内鬼”。孙玲玲介绍,虽然买卖和交换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要手段,但放眼整个犯罪链条,内部人员泄露信息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要源头。“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公司、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是通过直接接触个人信息的工作便利非法查询、下载;或是间接利用自己的职务或工作关系请托他人帮助查询、传输;或是直接将爬取数据的软件、程序植入本单位的计算机后台系统,均能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只要个人信息流入“黑市”,就可能被大量地重复交易。”孙玲玲表示。

随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肖江峰发布了北京法院审判的3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典型案例。他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其中,被告人沈某案发前系某大型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利用任职便利,采取“撞库”等方式获取某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用户名和密码,通过其所属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该银行之间进行专线互联的终端机,数次非法登录该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查询

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份。此外,沈某此前曾采取上述同样作案手段,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0余份。

什么是“撞库”?据肖江峰介绍,这是网络安全领域中的概念,一般指的是攻击者通过一些自动化工具针对数据库站点的相关接口批量提交大量随机的用户名/密码组合,记录下其中能成功登录的组合并盗取该账号,为接下来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做好准备。

西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沈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予以惩处。鉴于被告人沈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西城区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沈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内外成因皆有

“内鬼”的存在为个人信息保护带来隐忧。孙玲玲指出,行业“内鬼”屡屡犯案,且团队化作案模式愈加成熟。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分工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一些“内外勾结”型犯罪甚至可以组建起从获取、交易直至变现、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全链

条犯罪团伙。同时,单位犯罪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也愈发常见,甚至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从决策到分管再到具体实施的条线管理与分工。

在内部原因之外,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事件为何多发?孙玲玲指出,在我国,互联网已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持有一部手机已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以个人信息为基础的大数据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生活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日趋普遍常见。

“从外部看,监管管理体系仍需完善,防止信息流失滥用的制度功能还不足。当前,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处理规则已基本普及,但超范围收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仍较为突出,需要外部环境加以约束。特别是面对格式条款、‘一揽子’使用协议,公民寻求救济的途径、方式不明确,很难高效、有力维权,导致大部分受害者权利遭受侵害后选择沉默甚至习以为常。”孙玲玲表示,“同时,行政监管体系提供公共服务与参与过程监督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知名度低,经营方式多依赖电话、短信等点对点推销的中小企业而言,只有尽可能多地搜集、掌握个人信息才能开展经营活动,从而导致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频发。对此类情况,应当加强行政手段的监督管理和引导,确保此类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此外,孙玲玲提到,技术升级迭代也显著提升了信息非法获取的速度和体量。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正在让生活变得愈发便捷和智能,面对随之而来的隐私困境,孙玲玲指出,全市法院将依法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准确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参与社会治理,既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又积极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首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X 西街观察

日本强排核污水 拿全人类健康当赌注

杨月涵

8月24日,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时间持续30年。

蓄谋已久,终于出手。8月22日,日本政府举行相关阁僚会议后宣布了这一决定,距离核污染水正式排海只剩下两天。

两天里,舆论滔天。决定宣布后,大批日本民众聚集在首相官邸前高声抗议,“勿将代价留给未来”“不允许仓促行事”等口号随处可见。同天,韩国多个环保团体强烈谴责这一计划,并敦促日方立即撤销排放计划。

对于排海决定,日本当局给出的理由是,福岛核事故至今,130万吨核污染水将至饱和极限,需要排水以安全关闭核电站。

但多年以来,这种蓄意营造出来的紧迫感和必要感却始终站不住脚。正如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科学家罗伯特·里士满所言,这是一个基于政治和金钱的决定。

日本的算盘打得叮当响,排海无非是省事省钱。妄图花小钱办大事,把安全隐患留给别人,把利益留给自己。

日本放肆、美国纵容、韩国暧昧,美日韩同盟在这个时候又鼓捣到一起,确实干不出什么好事儿。

至于东京电力公司所谓的放射性物质净化“达标”,更是难以服众。核污染水与核废水有着天壤之别,两者性质不同、来源不同,处理难度更不同。

福岛核污染水总量之大、成分之复杂、处置周期之长史无前例,处理的成熟性和有效性本就有待验证。而在长达30年的排放时间里,如何确保多核素净化处理系统(ALPS)长期高负荷

运行的性能与效率,更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环保无国界,事关全人类生命安全,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核污染问题由不得“画饼”。德国海洋研究机构研究表明,自排海之日起,57天内相关放射性物质即可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10年后蔓延至全球海域。

核污染水一放了之容易,后患却难除。福岛核污染水中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例如氚、碳-14、碘-129等。

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氚会被海藻吸收,形成稳定的有机氚,被鱼虾吃掉后,走向人类的餐桌。而对人类和海洋生物来说,碳-14和碘-129的危害可能比氚更大,其中前者的半衰期超过5000年,后者半衰期更是长达约1570万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声称,日本政府将对未来数十年的排海承担责任,且不说流水的日本首相,区区一国政府,又如何负得起全人类生命健康的责任?

要为全人类安全负责,起码先问问全球人民支不支持,答不答应,愿不愿意。动动嘴皮子就能为全人类负责?

在全球化面临诸多问题的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现实的客观存在。在全球关切的重大健康、安全议题上,环境治理也需要重塑新秩序——一个强调责任的新秩序,一个不把利益凌驾于安全之上的新秩序。

“覆水难收。”8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用这四个字做了回应。汪文斌说,我们不希望2023年8月24日成为海洋环境的灾难日。如果日方一意孤行,就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2.39亿单身人口的经济题

“不是脱单难,应该是越来越多人不愿意脱单了”“‘宅’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住宅”……七夕刚过,8月23日,“我国单身人口2.39亿”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业内分析指出,年轻人不愿“脱单”并非中国独有,这也是一个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从全球来看,婚育率下降的总体趋势难以逆转。我国也正持续出台鼓励婚育的政策进行应对,从而为社会经济运行形态随之发生的转型与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并不急于脱单和结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约为2.39亿人。同时,我国年轻人婚育年龄普遍推迟,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的24.89岁增加了3.78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研究所研究员陆小成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2.39亿单身人口”数据发布并引起广泛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婚恋现实情况。但更准确地说,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单身人数并没有2.39亿人。“因为15岁以上到适婚年龄以下的单身很正常,并没有参考价值,所以讨论的重点应该是适婚年龄层的单身。不过,这个的总数还是比较大,依然是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我国单身人口2.39亿”的话题讨论下,有一则“找搭子”的热评显得清奇。这位网友声称,“91年单身,单身快乐。有没有一起加群旅游和看演唱会的?找个搭子”。

“95后”北漂族王喆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并不急于脱单和结婚。“单身和未婚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意味着

现在一个人也能活得比较好,为找人而找人、搭伙过日子对抗风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事情就是水到渠成,自己开心最重要。”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越来越多的当代年轻人选择单身,一方面是一个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以及社会福利的不断提升,家庭逐步失去了社会个体的部分生活依托功能,大家更加强调个性与独立,因此导致了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人群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人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到位,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反映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补齐的短板。

“另外,年轻一代也基本不再关心‘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白头偕老’等传统的婚育观念,结婚和生子更多是因为个人情感需要、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和基于对孩子的喜爱,夫妻扶助和养儿防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逐步抛弃。”柏文喜说。

从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来看,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创下1986年(民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为1986年以来的数据)来的新低。同时,根据去年以来各省份陆续发布的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及部分省份民政部门发布的数据,17个省份的平均初婚年龄均已超27岁,其中有8个省份平均初婚年龄已超过29岁,黑龙江平均初婚年龄超过31岁。

持续施策争取时间和空间

陆小成表示,在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当前年轻人不恋、不婚、不育的现象也会进一步加剧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由此也可能会带来未来劳动力减少、老年人

增多带来养老压力等一系列的难题。

据悉,我国自2022年开启人口负增长,并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一个“养小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养老为主”的社会,且随着时间推移,养老负担越来越重。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晚婚晚育或者不婚不育,会给社会带来很大压力,并形成长期性的、系统性的影响。但这并非是中国独有,其他发达国家早就出现这类问题。”在陆小成看来,未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小家庭化等趋势可能日趋明显,以及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加深刻,“这是值得持续关注和跟踪研究的课题”。

柏文喜则指出,今后婚育率下降的总体趋势难以逆转,但是相应的改善与干预政策还是能够有效提升婚育意愿和减缓人口下降态势,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运行形态随之发生的转型与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主要还是要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从管理思想上彻底扭转,将鼓励婚姻和生育的制度落地,注重福利制度的建设。在不少发达国家,除了一次性的资金奖励外,还会注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等,甚至是每年的生活成本都考虑在内,全力以赴减少育儿负担。”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对此,陆小成也表示,目前我国也陆续出台了鼓励婚育、生“二孩”“三孩”等政策,但政策落地的主要障碍还是在于婚育成本太高,有些政策执行力度和扶持策略不够,延长产假、新生儿免费医疗、增加生育补贴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也需要跟上,来解决更细节性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实习记者 程靓